
為印刷辯護：機印本取代手抄書的歷史意義——
評《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》

Defending For the Printing Press: significance in the
replacing of the manual transcription

卞冬磊 Bian DongLei*



* 卞冬磊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（Journalism school of Fudan University）2010 級博士生、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。Email: biandonglei@gmail.com

壹、辯護的起點：三大思想運動與印刷術

火藥改變戰爭，指南針促進航海，印刷術有什麼用？

「文藝復興」研究群對印刷不大感冒，他們認為印刷固然影響深遠，但只能算作文藝復興精神的副產品：「印刷術太靠後，排在近代歐洲頭生子(即文藝復興)的降臨之後」(頁 15)；甚至如波爾加(Bolgar)這樣的學者還直言不諱，義大利文藝復興並沒有受到「印刷機新穎技術的推動」，「復興的模式早在印刷術產生影響前就已確定」(頁 110)。

「宗教改革」的研究者似略顯寬容，他們承認宗教改革是「第一場獲得印刷機輔助的運動」，因為「路德(Martin Luther)派一開始就是機印書的孩子，憑藉這一媒介，路德才能夠在歐洲人的思想上打上準確的、標準化的、難以磨滅的印記」(頁 187)。

研究「科學革命」的學者卻毫不待見印刷術，他們傾向否定它的影響力，因為印刷並未能加速「新」理論的採用：「沒有證據表明，印刷術促進了新思想的傳播……事實上，中世紀的科學文本的刊佈，可能使哥白尼(Nicolaus Copernicus)被接受的時間推遲了」(頁 283)。一個顯著的現像是，在印刷出現後，托勒密(Claudius Ptolemaeus)的「地動說」反而取得了空前的「滲透的勝利」(頁 383)。

面對歐洲近代三大思想運動研究者的論調，本書作者伊莉莎白·愛森斯坦(Elizabeth Eisenstein)認為他們無一命中事實，她在與每一場思想運動的研究者辯論時，都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：15世紀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之所以成為恒久的、而不是短暫的運動，要歸功於印刷(頁 180)；近代的宗教革命，印刷所起之作用不僅在於「輔助」，「而且本身就是由印刷機的力量塑造的，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刷機引起的」(頁 187)；對於科學研究者的否定，她反唇相譏說，「如果你從相反的方向，如果你從相反的方向去考慮托勒密的舊理論衰落的速度，答案就會不同」(頁 320)。

進而，愛森斯坦從研究法國革命史的主業中抽身，投入到為印刷正名的辯護之旅中，這一旅程花費了 15 年時間，造就了本書的誕生。她試圖以歷史學家的方式說明，印刷是近代歐洲文化變革的動因：它不是僅僅促進了原有存在的變革趨勢，而毋寧是那些變革發生的原因；兩者不是程度的差別，而是質的不同。

貳、淹沒於歷史事件之中的印刷術

印刷，這個人類社會最為重要的發明，它的影響力，難道不會被近代歐洲汗牛充棟的文獻描述過？

當然不是。「早期印刷機的投資」、「地方書籍的銷售」、「熟練排字工勞動條件的和社會騷動」、「閱讀公眾的成長」，這些略顯零散的主題早就有人問津；而另外一些整合性的、類似「穀登堡發明之後一百年裏的印刷、銷售和閱讀」、「書籍的誕生」、「五百年來的印刷史」等事關宏旨的研究成果亦相繼出現，它們無不肯定印刷術的重大影響。

面對這些蔚為壯觀的研究，愛森斯坦卻指出一個棘手的問題，「同意印刷術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總是止步不前，不告訴我們重大影響究竟是什麼」（頁 4），她並進而疑惑到，為什麼從手稿到印刷的重要性普遍被承認卻得不到很好的證明？這是一個「尚未被公認的革命」。

這並非研究者們的故意留白。乃是因為，「準確描繪這些影響有難度，連判斷這些影響都有困難」；猶有進之，「描繪書籍的數量是一回事，判斷書籍如何影響精英的學習、思維和感知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」（頁 5）；何況，「我們的經驗之中沒有與手抄書文化相似的東西」，印刷之前的書面交流體系實難以重構（頁 6）；再加上近代歐洲 15 世紀以來的巨變，印刷只不過是「混雜在眾多稀奇古怪發明」裏的一個，它的個性早已被淹沒，誰還能為它尋找到恰當的位置？（頁 12）

退而言之，也許我們真並不應誇大印刷的影響力。試想，在概覽千年的長時段歷史時，當印刷被放置在黑死病和發現新大陸之間，當

它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相提並論，它本就處於不那麼起眼的位置；當它和文藝復興這麼巨大的文化事件發生勾連時，卻又姍姍來遲，只不過是文藝復興這個大思想運動駁雜子目錄下的普通一員；如若再往後走，17、18 世紀的思想政治革命就已放進前工業化的語境當中了，印刷文化早已被置於邊緣、冷落一旁（頁 16）。

參、從手抄書到機印本：突變與革命的視角

面對各種泛泛而談和回避策略，愛森斯坦直指問題之要害：「那些認為印刷的影響難以澄明、或者認為印刷被許多發明或事件掩蓋在歷史進程之中的觀點，之所以缺乏發現的能力，乃是其單一的思維方式——視歷史為漸進和演化的模式——所致」（頁 20）。

譬如，費弗爾與馬丹（Lucien Febvre & Henri-Jean Martin）在《書籍的誕生》中就認為，「穀登堡（Johannes Gutenberg）的發明只不過是一個大『團隊』變化裏的一個成分，於是，活字的發明和應用就可以被認為是此前一系列發展變化的副產品」。在這樣的歷史世界觀中，「手抄書和印刷書之間沒有明確的分界線」，因而印刷術出現後的五十年裏，「並沒有發生明顯的文化變遷」（頁 20）。

這樣的論點本來頗有說服力。但愛森斯坦卻有充分的理由證明，只要調整視角，就會有新的發現，即在手抄書和機印本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，這一發展本身就是一個「大團隊的變化」，人們需要發揮想像力才能夠彌合抄書人時代和印刷商時代的鴻溝，「你首先得承認這條鴻溝，然後才能彌合這條鴻溝。反過來，承認這條鴻溝就意味著，你要解釋非連續的觀點」（頁 20）。

歷史思維方式的不同決定了看待印刷的眼界。在漸進和演化的思維之下，歷史學家似已達成一致：「印刷的主要效應是加速了書面傳播的容量和廣度」。根據這一認識，印刷促進了變革，或者由於印刷的存在，變化更加劇烈和迅速。由此，「大多數學者將印刷看作變化的外在大力量」（C. Marvin, 1979：793）。

這個共識恰恰為愛森斯坦所反對，與上述學者不同，她要採取的是「突變和革命的模式」。按照她自己的說法，「不這樣，就無法解釋蘊藏在手抄本和印刷機之間的變革力量」（頁 20）。

她並非孤軍奮戰，馬歇爾·麥克盧漢（Marshall McLuhan）就是最著名的援軍。麥克盧漢「用簡單（卻不優雅）的方式，將一切事件做非線性的呈現，完全擺脫紀年的順序和歷史語境，天馬行空地闡述從圖像到語詞、從耳朵到眼睛」（頁 24）。但他的風格過於獨特，給人不信任之感，「儘管重構個人意識，是我們將印刷作為歷史動因時正想去瞭解的問題，但他卻留下了令人費解的迷惑」（C. Marvin, 1979：793）。

與麥克盧漢不同，愛森斯坦是一個歷史學家，她必須依靠歷史材料去為自己的觀點辯護，於是，借助歐洲三大思想運動，她在許多人業已停止的地方起步，將研究的時間起點定在「首批標明出版日期書籍問世之後，即穀登堡的直接後繼者開始工作的時候」（頁 26）。

不過，她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，印刷機何德何能，能夠承擔變革動因的角色？這個問題將她的研究指向了理論建構。

於是，相對於手抄本的印刷文化特徵被一一挖掘出來，本書第一部分主要描述印刷作為傳播革命的主要特徵：書籍產量顯著增加，有利於舊思想的結合，從而產生出新的思想體系；機印書的標準化促進作者更加強烈的個人意識；文本重組和文獻索引的新方法培養了讀者對系統精神的追求；通過回饋機制使書籍更加準確；印刷的固化功能或使過去的知識得以保存，使學問進步；不斷增加的文本具有放大思想的力量；聆聽型的公眾向閱讀型轉變，使得他們對遠方事務的間接參與增多；印刷書還培養了新型的知識份子，這些人脫離了對本地的忠誠，成為流動的階層（頁 26-95）。

對印刷文化的初步界定，為其後歷史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。之後，愛森斯坦就轉向了歷史分析，即印刷如何導致了早期近代歐洲引

人入勝的啓蒙運動、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。

肆、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：三大思想運動之再解讀

對於文藝復興者的陳詞濫調，愛森斯坦選擇將計就計，她承認文藝復興的開始先於印刷的發明，「既然文藝復興業已開始，我們不妨問，這一場文化復興如何受手抄書文化向印刷文化過渡的影響」？（頁 104）由此，她以印刷發明的時間為界，將文藝復興一分為二，試圖分析前後兩階段的變化，以此通向印刷作為變數的結果。她發現「印刷導致了復興的理念的變化」：手抄書時代的古代觀是「瀕臨復興的時期」，印刷以後的古代觀是「完全與當前隔斷的過去」；印刷術出現之前，復興是掌握拉丁文、閱讀早期教父的著作、恢復古籍或古代遺存的圖像；在印刷出現之後，復興指向了理性之光，脫離了對古人學問的恢復。概言之，與 9 世紀和 12 世紀的兩次短暫的復興相比，15 世紀的復興為什麼顯示出恒久的特質，「這幾乎是由印刷術的保存功能而來的」，「一個固化的距離把活生生的當下與古老的過去分割開來」（頁 183—184）。

對於宗教研究者謹慎的讚美，愛森斯坦並不領情，她認為研究者「腰斬了印刷的影響」（頁 17），其「塑造人們觀點的功能被完全忽視，其作用僅被認為是傳播過程業已形成的觀點」（頁 228）。由於大多數宗教改革研究者以路德為起點，而不是以穀登堡為起點，因而他們錯誤地「把兩者的先後順序顛倒了。殊不知，印刷術尚未廣泛傳播新教時，它就已經使基督教世界四分五裂了」（頁 228），而這正是宗教改革發生的前提。有鑒於此，愛森斯坦的觀點鮮明爽快：「印刷商發揮的作用遠遠不只是反映宗教改革，而是為宗教改革鋪平道路，他們確保了宗教改革的開花結果」（頁 232）。

對於常以《天體運行論》的銷售不佳來證明印刷對科學革命並無實質影響力的研究者，愛森斯坦反駁到，「如果早期印刷商的功能被局限於新思想的傳播……他們與天文學打交道時就不那麼有效，……

但如果你考慮的是舊理論被擯棄而不是新理論被接受的情況，問題就不會那麼麻煩」（頁 383）。進而，她解釋到，初期的機印書是手抄書文化的延續，托勒密學說的復活對哥白尼學說被廣泛接受必不可少，因為「先要消化這一遺產然後才能夠超越它」。此外，印刷使科學變成公共知識，「從手抄書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變遷發生在前，世界觀的轉變發生在後」（頁 286）。正如她所引述的，「近代科學在印刷術之後很快崛起，這絕非偶然……力量稍遜的技術不可能提供科學界需要的這種傳播系統」。因此，當「爲什麼托勒密的《天文學大成》的權威性維持了 1400 多年，哥白尼的《天體運行論》只不到一百年就將其超越」這一問題被拋出時，印刷對於科學革命的意義就一目了然了（頁 298）。

在本書第二、第三部分，作者以歷史學家的方式，通過海量文獻和綿密分析，描繪出印刷在歐洲三大思想運動中作爲變革動因的歷史情景。本書顯示，在手抄書和機印本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，印刷對這一鴻溝的跨越，恰顯示了這一技術及其文化對近代歐洲社會的巨大影響力。這是一部浩浩蕩蕩、百科全書式、以論戰爲特色的關於印刷文化的佳作，雖常被批評爲誇大了印刷的作用，卻無妨其成爲這一領域的經典。作者不嫌繁瑣，深耕細作，最想告訴讀者的就是，印刷不只是一種傳遞思想的工具，也是塑造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力量，「你不能僅僅把印刷術當作複雜因果關係的許多要素之一，因爲傳播變革使因果關係的性質發生了變化」（頁 437）。也正因爲對這一觀點之堅持，作者被追認爲「媒介環境學派」的代表。

參考文獻

Carolyn Marvin. (1979). Review on the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. *Technology and Culture*, 20(4), 793-797.

何道寬譯（2010）。《作爲變革動因的印刷機：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》。（原著：Elizabeth Eisenstein）。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。